

掌握命运 创造历史的哲学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

A Philosophy for Controlling Destiny
and Creating the History
Research for the Paladigm of
the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 陆剑杰 著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2005年立项BZX001课题最终成果

2010年全国规划办鉴定为“优秀等级”

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

◎ 陆剑杰 著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范式的研究/陆剑杰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533-0416-8

I. ①掌… II. ①陆…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国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3816 号

书 名: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

著 者:陆剑杰

出版发行: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南 京 出 版 社

社址:南京市太平门街 53 号 邮编:210016

网址: <http://www.njpbs.com> 淘宝网店: <http://njpress.taobao.com>

电子信箱: njpbs1988@163.com

联系电话: 025-83283871、83283864(营销) 025-83112257(编务)

出 版 人:朱同芳

责任编辑:鲍咏梅

封面设计:王 敏

责任印制:杨福彬

排 版: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36.75

字 数:688 千字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33-0416-8

定 价:99.00 元

营销分类: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论专著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 18 项学术工作

笔者本人对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在 1845—1847 年间创立的哲学作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一直致力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多视角研究。我的这项研究,密切联系中国现当代的实践,这就引导我考察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怎样的哲学、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怎样的哲学的问题。

笔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课题,正规地说来,开始于 1991 年。到 1993 年,写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 月出版)。在这部被我国学术界看作是“比较系统和深入地论述”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作”中,^①在“导论”、“本论”之后写了“续论”,把毛泽东(1893—1976)、邓小平(1909—1997)的哲学思想解读为同马克思的原创思想历史地联系着的实质上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此后,笔者发表了多篇论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文,包括 1996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在中国现当代实践中的确证》、1997 年在《求索》发表的《从中国现当代实践看马克思辩证法的真实结构》等。到 1998 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时,向中央举办的全国研讨会提交了《论邓小平创造科学理论的思维方式》的论文,^②并以此文在中共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做了报告。这篇文章代表了笔者的一个新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质就是中国化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正是依靠这一思维方式,我们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掌握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创造了中国现当代的崭新历史。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 2002 年、2007 年中共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一系列科学理念的有效实施,我国哲学界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开展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其间,出现了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政治淡出、学术凸现”的倾向,断言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缺乏学术性,不合哲学之“法”,是“官方哲学”、“御用哲学”。针对这种倾向,笔者于 2004 年底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哲学教材编写组参加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区分

① 参看杨学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30 年:学术回顾与反思》,《光明日报》2009 年 1 月 20 日。

② 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 年第 1 期。

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

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种形态的哲学的意见,^①此论引起哲学教材编写组几位首席专家的关注,引发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笔者的研究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理论体系和学术进展》在2005年4月被列为国家资助课题(课题号05BZX001),从此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经过三年的努力,写成了这本60多万字的著作。在听取了我国哲学界知名学者张奎良、许全兴、李德顺、雍涛、吴晓明、王贵明等的意见以后,笔者作了结构的重要调整和内容的多处修改,于2009年10月成书。在这里,笔者把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所做的学术工作和由此获得的成果分为18项简述如下:

一、界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本书中,笔者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径直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对应和区别于有公认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就其已经中国化而言,它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学科。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在实践中运用而得到的体验、认知加以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中国传统的优良哲学文化相结合,既吸取其具有生命力的学说,又赋予其新的诠释和内涵,从而具有中国气质和中国作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相结合,将其加以升华,从而形成一系列新的学理、构成一个新的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逻辑学的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中国化的实践论为理论硬核的、引领现当代中国发展的科学方法与价值原则的哲学体系。

二、区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大钊(1889—1927)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中国,它就成了“在中国”的了,然后被中国共产党人所运用、发展并加以中国化,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前提,二者的同存共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的奇观。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同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基本上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把马克思创立的哲学及其世代延续只当作学术来研究,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于是否同中国自古代以来的优良哲学文化相结合,基本上不结合中国自古代以来的优良哲学文化,

^① 参看拙作:《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开马哲讨论中的一个“结”》,载《东吴哲学》2004年卷。

不具有中国气质、中国作风的,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于是否同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相结合,对这一极其丰富的智慧宝库不予置理,对升华这一智慧的哲学创新没有旨趣,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此种哲学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有学术的意义。支持它的发展,这是贯彻“双百”方针、繁荣科学文化的需要。本书提倡正确处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一是相互尊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尊重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应当尊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加强合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主动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资源,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以来自实践的哲学智慧启发自己、丰富自己;三是力求融合。二者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融合起来,着力培养二者皆通的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

三、指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深湛哲学修养的领导人和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家持续合作,共同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现实性(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科学性)相统一的本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法”。不是谈“合法性”吗?只有真正把现实性和学术性结合起来的才是具有合法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是中国革命家们为了掌握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而引来的。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中不乏兼为卓越学者的人物。一身二任的李大钊、毛泽东们倡导、指引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的工作是同广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相互结合,共同完成的。李达(1890—1966)、艾思奇(1910—1966)、张岱年(1909—2004)、冯契(1915—1995)们对此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197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中缺乏专业的哲学家,而在大学里开课传授、研究机构中立题研究的学者们又逐渐离开中国当代的实践。这才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野;也产生了某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为所谓“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释。实际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现实性与学术性同具的完整哲学。从事这样的研究的学术工作者,既为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实践观念选择,做出理论总结,提供哲学资源、学术见解、政治建议;又尊重党和国家文献中实践智慧的如泉涌动、哲学创新的不断出现,将其非显性的哲学学理显性化,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发展做出贡献。应该说:中央领导集体内具有深湛哲学修养的人同学术界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的紧密合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具现实性与学术性的主体基础。

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004

四、采用将非显性的哲学内蕴加以显性化的解读方法

本书是诠释与整合性的著作,就是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浩如烟海的文献作出两方面的解读:一方面,是将富含哲学宝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著作中的蕴含性的亦即非显性的哲学思想显性化,使之转化成为哲学原理;另一方面,是将分散在历代领导人和哲学家著作中的非显性的学理体系,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梳理并整合成为显性的逻辑合理的学理体系。这里的显性化包括:在实践理念中潜在的哲学范畴的显性化(如:从各种现实环境的可能性分析中提炼出“可能性空间”范畴);在实践原则中潜在的哲学原理的显性化(如:从思想路线诸原则论述中概括出实践具体性、批判性、创新性原理);在各种著作中潜在的哲学思想系统的显性化(如:从毛泽东、邓小平大量著作中揭示“历史创造论”思想系统)。我之所以区分显性的哲学著作和非显性的哲学蕴含,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主要途径是在其运用中,在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的結合中,吸纳古人的优良哲学文化,升华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创造出崭新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大量的非显性地存在于各种文献中的。如果我们把这些著作、文献看成是所谓“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学术内涵,那么,我们会舍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绝大部分学术创新,这个哲学形态也就不能成立。因此,笔者要申明:本书所用的主要方法是将非显性哲学蕴含通过诠释加以显性化的方法。

五、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转型、成熟的历史过程

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的论点,^①中共十七大又提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包含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三个相续的形态的判断,并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②依据于此,又考虑到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我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区分为形成、转型、成熟的三个阶段。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经历了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到1945年党的七大的漫长过程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同以李达、艾思奇等为代表的党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合作,提出并初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共同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1937年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奠定其基础,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系列富含哲学思想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著作丰富其内容,党的七大以科学与价值统一、理想与

^① 参看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编:《中共中央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1页。

^② 参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现实统一、党性与个性统一为其显著标志,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哲学形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型是指从革命、革命战争为实践主题的形态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主题的新形态的转移。这种转型的完成归因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与党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紧密合作。毛泽东 1956 年写的《论十大关系》和 1957 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其开端,“思维存在同一性问题”、“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问题”的激烈争论显其艰难,到 1978 年实践标准讨论吹响转型号角。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形成了引导中国人民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历史的历史创造论,标志着转型的实现。这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了具体的实践论、批判的实践论,又有了创新的实践论、建设的实践论;既有了革命、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又有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辩证法;既有了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人学,又有了显示人的一般本性、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历史任务的发展的人学。转型的实现,展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是指具有全面性的哲学体系获得了鲜明的学理标识。这些标识是:中央在我国哲学界所作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古代以来人学思想发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原则及中国哲学家对此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诠释;中央在我国哲学界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与中国古代以来理想价值观发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及中国哲学家对和谐辩证法的阐发。这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学术性统一、理论继承和理论创新统一的本质,从始至终都是在中央领导集体与中国哲学界学者们合作之下共同实现的。

六、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总问题

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马克思的哲学,确定了实践论的核心地位,超越了“从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极对立和都不懂得实践论的共同局限。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中的人作为主体、对象世界作为客体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以中国现当代实践中中国人民作为主体和中国现实世界与既成社会作为客体的主客体关系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的命运”问题。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是中介化了的社会,因而存在着各种发展可能性和多条可走的路。中国现当代实践中的主客体的关系问题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就产生了中国的命运问题。它是中国现当代实践中主客体关系这一基本问题的集中表现,因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问题。冯契说过:“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时代

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

的中心问题。”^①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在哲学上应当就是中国的命运的问题。命运范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义重大的总体性范畴。

七、认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

这样认定,当然有逻辑推演的成分,即:既然马克思早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十一条中,每一条都以他的实践论为中心来论,断定这一超越“从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的实践论是其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成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定也以实践论为核心,并且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理论硬核。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转型、成熟过程作出历史分析,得到逻辑结语。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阶段,毛泽东已经提出了马克思未曾明确提出过的具体实践范畴,反复论证社会实践的具体性,从而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相应地,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并创造性地论述了特殊矛盾范畴,阐明了上述思想原则的辩证法基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型阶段,邓小平为实事求是原则加进解放思想的前提,着重论述了社会实践的批判性;江泽民则从实践批判性中引申出实践创新性,将思想路线进一步拓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阶段,我国哲学界又在实践具体性、实践批判性、实践创新性的基础上着重提出并论释实践人文性,要求理解和贯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范导与人文关怀相统一的本质。这个历史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中国化的过程。

逻辑是历史的沉积,本书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硬核概括为:实践范畴和具体实践范畴辩证统一、普遍矛盾范畴和特殊矛盾范畴辩证统一、实践批判性和实践创新性辩证统一、实践科学性和实践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新实践论。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概括,是中国哲学界的重大的学术创新。

八、判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旨是掌握中国的命运、创造中国的崭新历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为了科学地说明世界,更为了实践地改造世界。这一哲学使命,在现当代中国具体化为掌握中国的命运、创造中国的崭新历史。

对命运范畴,笔者考察了东西方学者自古代以来的哲学探寻,总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和解决中国命运问题的思维进程,给出了这一范畴的两个定义。其一,“命运是抱有一

^① 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

定价值目标的主体,在实践初始条件约束下,从可能性空间中做出选择、接受检验、付诸实践、创造历史的过程和结局”;其二,“命运是诸价值主体所面对的实践初始条件约束下的一组可能性”。定义二,是定义一的进一步逻辑化。笔者指出:“掌握命运”,就是通过实践消除命运的不确定性,实现符合主体价值要求的确定性;就是克服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具体历史的统一,进而谱写出创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篇章。

九、铺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体系,把它理解为上述理论硬核和实践宗旨由抽象到具体的合逻辑展开

笔者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体系,看作是其理论硬核——中国化的实践论和实践主旨——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逻辑展开。从新实践论的逻辑展开来说,我首先阐释它的元理论,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着上述四个辩证统一的元实践论;与元实践论全面重合、以实践中主客体关系为经线、辩证法规律与方法为纬线的元辩证法;与科学维度紧密结合、由个人本位与人民本位的统一作基础的元价值论。元理论的由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构成三个哲学形态:

其一,实践论的世界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以中国人民的具体实践为基础、以这一具体实践所面对的作为当今世界的一部分的中国既成社会为客体、以这一主客体关系在实践中不断从对立达到统一为指向的现实世界。其二,实践论的认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突出改造中国这个现实世界的规范的认识论,实现反映、评价、规范的三种认识形式的统一;突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中国人自己、创造中国的一代新人的认识论思想,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内圣外王”、“修身正心”思想的批判改造,也是对冯契“转识为智”的广义认识论思想的肯定和重释。其三,实践论的历史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在历史本质、历史过程、历史规律诸方面全面升华了中国人民现当代实践的智慧,形成了作为实践宗旨之展开的、引导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历史的“历史创造论”。

十、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中介辩证法

“中介”是黑格尔辩证法中最重要的范畴。张世英说:“在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那里,‘中介’有间接、凭借、工具、手段或中间过程、展开过程等等含意。”^①笔者理解,中介就是联系的间接性。按此理解,黑格尔的中介有三义:一是对

^① 张世英:《黑格尔〈小逻辑〉绎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5页。

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

008

立面之间互相依凭、互相规定的“互为中介”；二是由互为中介引出的对立面之中项，它具有亦此亦彼的性质，成为两端项的中介；三是辩证法的否定是有中介的否定，通过中介性否定，事物从肯定达到否定之否定。恩格斯和列宁在新唯物主义基础上，重论中介范畴，突出黑格尔辩证法中介范畴的第二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运动经历了三个中介型社会形态——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仍有中介性并正在消解中介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全面肯定中介范畴的上述三义，特别强调矛盾结构两极端之间亦此亦彼、居间联系的中介环节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求以中介观念去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中介过渡性，尤其要求用中介性政策和战略来应对实践任务，通过中介性建构来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形态。在经济方面，我们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机制建构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方面，我们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类文明一般成果的民主政治机制建构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在文化形态方面，我们“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①从而把中国优良文化同西方先进文化元素建构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形态。

十一、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彻底的实践性

自从列宁（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1870—1924）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断定：“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②之后，似乎认识论中彻底坚持实践论已不成问题了。其实是成问题的。其中有两个问题最突出：一是忽略由理论到实践需要由决策、设计的“规范性认识”作为中介。有些教科书之所以强调反映论而不提规范论，是因为他们把认识的任务停止在理论的建立之上，讨论实践检验也把落点放在理论的科学化上。笔者在书中指出：这是理论科学家的认识论而不是实践革命家的认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最重视规范性认识的研究并得出了创新的哲学结论。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含有三个环节：从客观实际中“引出”思想、理论的反映环节，在一定思想理论指导下“提出”路线、政策的规范环节，将决策转化为行动的实践环节的论断；^③关于规范性认识是人的实践中决定主体生命的论断；^④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实践检验不仅对着理

①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③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7页。

④ 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98页。

论,尤其对着规范性认识的决策的论断,^①都是在认识论中坚持彻底的实践论的意义重大的论断。二是忽略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问题的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古代思想家“修身正心”的合理思想,形成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强调主体自省、自律的自我改造,形成了“两个改造”的哲学思想。冯契等哲学家们更为此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冯契的“转识为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一系列论断,^②以及他的把“改变世界”扩展成为“改变世界、发展自我(其中包括自我实现、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主张,^③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质。有了这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才成为彻底的实践论的认识论。

十二、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聚焦为引导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历史的历史创造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论断,^④在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从而创造中国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的新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创造论。

本书认为:邓小平 1992 年春天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发展中集大成的著作,也是一篇潜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创造论的比较完整的学术思想的政治著作。本书主要依据这部著作,通过“化非显性为显性”的诠释方法概括出这一历史创造论的基本理论:(1) 人民创造历史的人民主体论;(2) 从探索到自觉的自觉实践论;(3) 从传统观念束缚下解放思想的实践批判论;(4) 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介实在论;(5) 以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为共同范导的社会进步导向论;(6) 在实践中形成新制度体制的历史选择论;(7) 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的辩证发展论;(8) 在实践创新和实践自律双重制约下走出“好路”“新路”的相对规律论;(9) 人既改造世界又改造自己的实践人本论;(10) 解决中国命运问题的命运掌握论。这十论将哲学理论按思维程序组合成一整套思维方式,是创造中国新

① 毛泽东:《政策和经验的关系》(1948年3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4页;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② 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页、第20页。

③ 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④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
— 〇〇 —

历史的人们实际上遵循的思想规范。笔者还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创造论是它的新实践论的最具体形态。

十三、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创新机制和由此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

笔者在界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源泉”和三个“结合”产生的途径，这也就是它的学术创新的源泉和途径。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结合中产生新学理，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创新的主要途径。这个途径产生的学理，大量地写在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他们之后领导人的著作中，也写在关注中国命运的学术家的书中；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诠释中国古代以来哲学中的合理成分、同时又以中国语言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从而产生新的哲学思想。这个途径产生的学术创新，大量地写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会通的学者们的著作中，毛泽东作为学者做了带头的工作，张岱年、冯契以及方克立、汤一介、许全兴等学者也都作出了有益而重要的贡献；三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相结合，通过升华实践智慧，形成哲学的学术创新。在这里，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与实践的中介。笔者在书中对于中国现当代实践的特别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和由此而产生的探索的智慧、实用的智慧、创造的智慧、纵横的智慧、求解的智慧、为人的智慧，作了详细的论述，并指明由此升华而成的创新哲学思想。在众多的学术创新成果中，以下的学理是人们应予珍重的：关于社会历史运动相对规律具有统计性的学理；关于对立面之同一性与对立性均既有相对性又有绝对性的学理；关于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均有其中介环节的学理；关于从实际出发利用既有矛盾或矛盾着的事素实行“设置对立面”、建构新事物的学理；关于可能性空间的边际和结构的学理；关于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中划分极性范畴和中性范畴的学理；关于命运范畴的界定和命运掌握的学理；关于历史创造机制包括选择、建构机制的学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范导维度与人文关怀维度相统一的学理；关于和谐辩证法的学理；关于以人为本中动力因与目的因相统一的学理；等等。所有这些创新的学理都是其他哲学著作和哲学教科书上所没有的，都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学理，来源于它同中国实践的结合，来源于中国自古以来优良哲学文化的积淀，来源于中国人民在现当代实践中所积累的实践智慧。

十四、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军事哲学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的实践，这一实践是具体实践，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各个领域展开,从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军事哲学的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大量地展现在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著作之中。研究这些卷帙浩繁的著作,不仅是研究它的分支学科哲学思想之必需,而且也是把握它的一般哲学原理所必需。

本书认为:各分支学科的哲学思想,核心是价值观念和科学思想的统一。本书不赞成说这些哲学思想中只有规律论没有价值论,也不赞成说其间只有价值论没有规律论。例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哲学,必须既研究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的规律,又研究政治发展中的价值原则和规范逻辑。笔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的规律是人民民主在中国的逐渐实现;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的价值则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的逐渐实现;将二者统一起来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的根本原理。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军事哲学同样必须研究各自领域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实现的基本价值。

十五、论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方法论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跟原创的、继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一。特殊地说: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价值观)和方法(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一贯用以指导中国人民的实践,它的方法论意义尤其突出。

本书根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实存状态和运用历程,突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只了解为革命的、批判的方法论的原初理解,概括为三个“统一”:它既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又是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人自身)的方法论;既是革命的、批判的方法论,又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建设的、发展的方法论;既是创新科学理论的反映的方法论,又是评价主客体价值关系,规范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价值与规范的方法论。后面这一个统一关系,证明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辩证法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矛盾方法论是串连在实践论的认识路线上的,它是反映的方法论、评价的方法论、规范的方法论,是实践论的方法论。

十六、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精神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中国人当今的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两个精神,通过发掘其哲学

^① 马克思:《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1842年6月29日—7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20页。

内涵,建立其哲学基础,就升华为当今中国人的哲学精神。

本书将这一哲学精神的内容辩证地概括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统一;高瞻远瞩的理想主义精神和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统一;独立自主的主体精神(民族精神)和学习外国的开放精神的统一;自我批评的自律精神和全面创新的创新精神的统一;不屈不挠的坚忍精神和敢决敢胜的果敢精神的统一;面对敌对势力的斗争精神和国际友好交往、国内人民内部协调团结的和谐精神的统一。归结起来,就是“掌握中国的命运、创造中国的历史”的实践精神。

十七、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古代以来哲学的析取与改造的工作

笔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以来哲学的关系总的说来是“流”与“源”的关系。但此“流”对于此“源”不是全水而取,而是分析而取。张岱年就提出过对中国古代以来文化“分析抉择”的思想。^① 本书综合毛泽东、刘少奇、张岱年诸公的意见,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对中国古代以来哲学分析而取应包括以下诸方面:第一,取其片面真理,化为全面真理。例如毛泽东所做的,将“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的观念论命题,肯定其意识能动性的片面真理,加以“实不明则名不正”的前提,化为能动唯物主义的全面真理。第二,取其相对性,化为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体。中庸,意为“择其两端而取其中”,在事物稳定地存在的阶段,这是正确的实践理念。然而,将中庸绝对化,在事物必须质变的阶段,居守中庸,就是保守的哲学思想。就是说,中庸在事物的不竭运动中只有相对性,没有绝对性;中庸与非中庸的一定结合,这才是现代中国哲学的正确观念。^② 第三,取其抽象性,化为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物。冯友兰提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抽象继承法”,即析取其范畴的抽象意义加以继承。^③ 在本书看来,中国古代价值观,例如和谐范畴,是对于当时充满矛盾、冲突的社会形态不和谐的超越性追求,当时的社会是具体的社会,因而当时提倡的和谐也带有具体性,甚至是对于周礼的复归。然而,它又有抽象性,即在无论何种具体不和谐状态之下,人都追求超越。正是这种超越性赋予和谐范畴以抽象性,我们可以在当代使用重新阐释过的和谐范畴。上述三种析取,同时又是对古代哲学的改造,将其改造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和原理。

① 张岱年:《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张岱年哲学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

② 参看毛泽东:《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1939年2月20日—22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0—163页。

③ 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1月8日。

十八、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跟世界哲学同其潮流

这个发现是从读到毛泽东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提出社会规律的统计性论点开始的。在时间上,毛泽东的论述,离开量子力学的创立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规律是统计性规律的发现只有10多年的时间;在空间上,中国工农红军是同西方世界隔离着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物理学的新动向。但是,在生动实践与对此实践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在陕北山沟沟里不但出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出了社会运动规律具有统计性的思想。

由此推开,笔者发现,在哲学潮流的视野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世界各学派的哲学有着相当大的呼应性质。如:第一,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哲学发生生存论转向,从关注认识规律转向关注人的生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同这个潮流呼应,它关注的就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转变与改善,就是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和幸福。第二,在世界范围内,实践哲学的发展也是值得重视的动向。虽然许多被称为实践哲学的学派,不赞成实践唯物主义,但是他们的一系列思想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海德格尔哲学跟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去甚远,但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关于哲学最重要范畴是可能性范畴的判断却非常可贵^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繁茂的可能性空间的思想是实践哲学潮流在中国涌起的浪花。卢卡奇(Georg Lukacs, 1885—1971)等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主题是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的论断就被毛泽东所吸取,虽然毛泽东本人并没有读过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但他的关于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的观念却与卢卡奇暗合。第三,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哲学转向人类社会实践工程的研究。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 1902—1944)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提出的“初始条件约束”,“从错误中学习”等社会工程思想,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规律既有绝对规律、又有相对规律的见地也是呼应的。^②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过程。本书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最强的整合性。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在其合理成分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后,科学与人文、真理与价值就实现了统一。

笔者的上述十八项学术工作,分别以十八个动宾结构的语言形式来表述,“界定……”、“区分……”、“指明……”、“采用……”、“分析……”、“论述……”、“认定……”、

^① 参看徐崇温:《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86页。

^② 参看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69页、97页。

“判明……”、“梳理……”、“揭示……”、“坚持……”、“提出……”、“阐明……”、“探索……”、“论释……”、“概括……”、“考察……”、“发现……”，所有这些语言表述说明：笔者的这部著作是诠释性的，又是创新性的。说它是诠释性的，因为所引文本除本人的若干篇著作属毛遂自荐，绝大部分都是自外于我这个诠释者的，我力求厘清文本的原意而阐释其哲学内涵；说它是创新性的，因为我大部分的论点都来自将已有文本中的非显性内涵显性化，形成了其中潜有而哲学中未有的新范畴、新论断、新概括，这个“新”是应当得到尊重的。所有这些表述又说明：笔者的这部著作是群体性的，是转述并诠释我国包括毛泽东、邓小平，也包括李达、艾思奇、张岱年、冯契等在内的广大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成果的，这些成果根植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当代实践，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又是个性化的，因为都是笔者本人按自己的理解去写的，其中也包含笔者本人的若干创新的见解。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作群体而言，个人的意见永远是不足的，待批评、待检验的。笔者的期望是：有更多的哲学家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学理的阐发，在多样化阐发的积淀中一步一步地接近这一伟大哲学的真谛，并且建构起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2009年2月17日晚写于并在2009年10月12日改成于南京银城东苑寓所